

【法学研究】

伊斯兰法创制困难的思想渊源

马进虎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从伊斯兰法的角度看,穆斯林社会衰落的关键在于教法不适应时代。教法的不适应是思想上的教条主义造成的,具体的讲有六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伊智提哈德(创制立法)的关闭和忽视教育;二是固执于个别非可凭信的明文;三是墨守形式主义和枝节末叶;四是宗派成见;五是不明立法理由;六是混淆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界限。通过分析指出,穆斯林社会的复兴必须解放思想,变法图强。

关键词:伊智提哈德;法律;适应性;创制

中图分类号:D81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5)02-0067-06

Reasons of difficulties in Ijtihad of Shari'a

MA Jin-hu

(Institute of the Middle East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viewpoint of Shari'a, the key of prosperity and decline in Muslim Society lies in Shari'a fitness for a certain era. The unsuitable law was caused by the ideological dogmatism. Specifically speaking, there are six aspects of reasons: first, the door to Ijtihad has been closed and the education has been neglected. Second, the unbelievable and unconfirmed provisions are stubbornly adhered; thirdly, sticking to conventions of formalism and trifles; fourthly, prejudices of religion sect; fifthly, lacking definition on cause of legislation, and last but not least, confus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religion and the secular. It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liberation of the mind and pursuing the strong and the prosperous through political reform must be done.

Key words: Ijtihad; law; adaptability; formulate

中世纪的阿拉伯文化博采众长、承前启后,其突出的作用、重要的地位、辉煌的成就无不赢得研究者的较高评价。但进入近现代之后,阿拉伯民族默默无闻,其文化建树很少,甚至国弱民贫。究其原因,一般认为,导致其滞后的原因有:殖民主义的掠夺,战争的破坏,内部动荡,道德堕落等等。不过这种解释似乎还缺少点什么?带着这类疑惑,近来翻阅一些阿语文献,笔者发现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有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过该问题。且认为穆斯林社会的兴衰在于教法是否适应时代。这种观点有一

定的代表性和相当的深度,笔者基本同意这种看法,并就此作一阐释。

一、伊智提哈德(创制立法)之门的关闭和忽视教育

伊斯兰法是以宗教律令统摄世俗生活为其主要特征的,故伊斯兰法的内容之一,就是深究信仰、崇拜以及社交问题的礼仪、细则和制度。因此,法理学家、宗教人士、法律专家,在伊斯兰社会中皆是同一称谓。可见,教法在伊斯兰思想史上,在广大穆斯林

收稿日期:2004-10-21

作者简介:马进虎(1963-),男,青海大通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回族及伊斯兰教研究。

的日常生活中,具有深远的影响。

从事伊斯兰教研究者都知道,伊斯兰的立法渊源较多,除《古兰经》、“圣训”、公议、类比之外,还有一些个别法学派别认可、建立在必然、惯例之上的原则,如哈乃斐派的从善原则、马立克派的公益原则。法学家以教义学,证实了立法渊源和依据的可靠性。他们既依靠立法渊源,努力探索,又依据法理,对照事实,推断公案,形成案例。这项工作就以“伊智提哈德”命名。“伊智提哈德”的原义为“勤奋”、“尽力”,引申为“创制立法”,其本质“解放思想”。它成为扩充条例、判断问题的方法,成为教法发展的有力因素。古代伊斯兰法学家从社会需要和时代条件出发,尤其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初期,以此繁荣了法学^[1]。

但是公元13世纪巴格达陷落之后,学术活动受其影响而中止,法学家一致认同“伊智提哈德”之门关闭,只满足于现成的四大法学派别,除上述的两派外,尚有沙斐尔派、罕百里派。这实际上下了思想禁令,结果法学和其他学科中盛行仿效、缺乏创新,阿拉伯文明开始僵化衰落。

然而,什叶派否认“立法之门关闭”一说,一些逊尼派学者也不赞同,如伊本·泰米叶(1263~1328年)、伊本·高目、扎齐叶。近代的一些改革家也追随其后,如伊本·阿布杜勒·瓦哈布(1703~1787年)、贾马鲁丁·阿富汗尼(1838~1897年)、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年)。他们一致肯定经训、公议、类比就是立法的明证“伊智提哈德”之门,不仅是畅开的,而且是法学家(穆智台希德)必备的素质。他们还一再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

毫无疑问,“伊智提哈德”之门关闭一说谬误在于倡导盲目模仿,在于放弃了独立思考。正确的说法在于解放思想,准许创制立法,准许思想自由。不过创制立法限于有资格的法学家,即穆智台希德,而思想自由适应于整个社会生活。

教育是穆斯林的义务,对此《古兰经》以反诘的语气表明,有学问者和无知者并不平等,只有理智者才会观察造物主的迹象,才会觉悟。而“圣训”更是鼓励穆斯林求知,哪怕远在中国,也要追寻,并将学者的地位提得很高,宗教人士被认为是穆斯林社会的专职学者,备受民众尊敬和爱戴。尽管“圣训”中关于求学问难的格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事实上多数穆斯林群众对教育义务很不重视,从而陷入愚昧、疾病、贫困、衰弱之中难以自拔。唯有学习方能使人走出困境,唯有教育方能提高生活水平,保持尊严。

只有履行好教育义务,才能成为真正的信士,才能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消除盲从,实现信仰和理智的统一。当然当今教育的主体是学校。这和传统教育有很大的不同,穆斯林要正视这一点,要承认自己的不足,虚心学习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如西方民族的实干创业精神,东方民族的军政经略智慧,就值得吸取,以奋起直追,犹未为晚。

二、固执于个别非可凭信的明文

伊斯兰法的主要依据是明文,而明文可分为经、训两部分。据说经是先由先知奉命传达的长流如水的天命《古兰经》,然后由其门弟子背诵传播,其后由首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573~634年)汇集起来,最后由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577~656年)汇编确定标准读本。因此《古兰经》是统一的。普通穆斯林也好,法学家也罢,对此一般都未有异议。

立法所依据的明文第二部分就是“圣训”,即先知的言论、行为、默许。在这方面,法学家对一些“圣训”的可靠性和可信度产生了分歧。首先表现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其次,同属逊尼派的法学家中也产生了意见派和圣训派之分,因为部分人接受的“圣训”却被另一部分人所拒绝;另外,先知没有命令人们象记载《古兰经》明文那样记录其言论。据传说,先知禁止门弟子这样做,以免疏忽经文,而只允许他们传述其言行。故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592~644年)拒绝汇集“圣训”,以防人们顾此失彼。尽管如此,在伊斯兰史上的有些时期,“圣训”著作很多。其目的是服务政治、支持派性、推销商品或为别的原因。其中许多“圣训”传述的线索模糊、违背逻辑、不合理智。

因此,法学家开始仔细甄别“圣训”,并制定了相应的检验标准,如传述线索是否连贯、清晰,传述者是否诚实可信,以便验证其正确与否,这门学科就是《圣训学》。圣训学家认为,很多“圣训”属于伪托之作。如有一段“圣训”说:“大海是地狱,老鼠是××人,菠菜能治所有的疾病”^[1],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还有一些“圣训”的真假难辨。

对“圣训”真假混杂的状况,主张革新的法学家,如伊本·泰米叶、穆罕默德·阿布杜等人很不满意,他们开始按教法和理智原则,提炼“圣训”。他们不同意《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中的一些“圣训”。如布哈里传述的一则“圣训”:“谁每天吃七个干椰枣的早点,谁在这一天就不受毒害,也不迷惑”。这则“圣训”显然是违背生活常识的,因而不正

确。这些例子说明,“圣训”中确有伪作,而穆斯林大众和一些古代的法学家则坚信不疑,并将其变为信仰和律例的一部分加以固守,放弃健全的理智判断,导致了社会的衰落。

出路是畅通的,即废止那些有问题的“圣训”,坚守法学家一致认可的“圣训”,接受符合理智和教义学条件的“圣训”。这种取舍标准是许多法学家都赞同的,如伊本·泰米叶说:“正确的教法往往是合理的”。穆罕默德·阿布杜也认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与科学、文明同步的宗教”。坚持理性的态度,应从虚妄、伪作、捏造中解放出来,抛弃违背经文、理智、逻辑的“圣训”,问题就不难解决。即便如此,有思想自由,就有认识分歧,因此对不同的意见还是要持宽容态度,只有如此才可以把分歧缩小到最低限度。即不同的认识不要激化到公开冲突的地步,仍然要合情合理更合法。

三、墨守形式主义和枝节末叶

伊斯兰法的根本原则只是少量普遍绝对的经典明文。至于法律的绝大部分细则条例,则是靠法学家的公议、类比和其他证据努力创立起来的。这些繁琐的细则条例充斥着法学著作,其卷册浩繁,需要皓首才能穷经。这些细则有时违背基本原则、程式僵硬、脱离生活、不合教义。而一些法学家墨守枝节末叶、盲目照搬、没有提炼、缺乏过滤。结果是枝叶遮盖了根本,形式淹没了内容,导致其社会文化僵化、衰落。

关于契约目的就是一个例子。订约原则是“关于契约的意义在于达到目的,而不在于字面和格式”。尽管有明确的基本原则,但法学家关于契约文字及其格式的研究极其冗长。他们设置了契约专门的制约条款,限定了应能证明目的的东西。这些细节好象成了契约的基础。与此类似的还有关于契约的条款^[1]。

订立契约的关键是立约双方遵循自愿、合法原则,即双方约定的准许的或禁止的条款,都是双方意愿的真实表达,同时不能违背时行法律。法学家都承认这一点,伊本·高目·扎齐叶说:“关于契约条款必须正确,不能依据废止的法律或违法”。虽说如此,各派法学家,尤其是哈乃斐派,对立约的节制条款及其细节、与未决条款有关联的或与约束条款相联系的正确契约、合法条款和无效条款的界定,极其繁琐冗长。他们使条款失效的途径增加了。这些事

足道的事务上耗费了大量时间,遗忘了缔约的根本是自由、合法原则,如果根据普遍认可的正确原则缔约,就会防止大量无效契约的出现,节约时间和精力。

因重枝节、形式轻原则、目的,而受害的另一个例子是:有关礼拜条件——清洁的研究。在礼拜前小净是经文的基本要求。“信道的人们啊!当你们起身去礼拜的时候,你们当洗脸和手,洗至于两肘,当摸头,当洗脚,洗至两踝……真主不欲使你们烦难,但他欲使你们清洁,并完成他所赐你们的恩典”。^[2]小净的规定是明白的。故要行割礼,要用汤瓶洗涤,既要防浊水反复,又可节约用水。但古代的法学家并不满意,刻意深究细节:何为清水、净水,何为污水;何物为清洁,何物为污秽,连篇累牍,长达数百页。对此他们分歧丛生,还过分看重这些。仿佛这些使人厌倦、烦闷枝节、形式倒成了信仰和崇拜的基础。假若抓住根本,将细节留给个人凭理智和科学去判断,这更接近于正确。今天的穆斯林生活在一个视时间为金钱、现代科学为生存、幸福、成功所必须的时代,如果要求他们像古代的法学家那样,耗费大部分的生命去理解这些细枝末节和形式主义,显然是不划算的。^[3]

为避免墨守形式主义和枝节末叶,就要坚持经文的基本精神和根本原则,面向时代,废弃那些附加的过时的法律意见、言论、观点、倾向,简化冗长的立法程序,恢复法律灿烂的光辉,就像初升的太阳那样生机勃勃,能动地适应时代。

四、宗派成见

人类思想史表明,人们思想认识的分歧往往难以避免,宗教分派的现象也属常见。伊斯兰教也如此,先知去世后,各种各样的教派就形成了,首先形成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对立。起初,两派的分歧往往在政治上,那些承认四大哈里发的人成为逊尼派(大众派),而只拥护阿里为哈里发的成为什叶派,即阿里党人,随着历史的演进,早期的政治分歧逐渐演化为宗教分歧^[4]。然后,逊尼派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伊拉克的意见派,以艾布·哈尼法(699~767年)为首,该派只接受少量的“圣训”,在许多司法问题上,多借助于理智和意见进行仲裁。另一派是汉志的圣派,以马立克(715~795年)为首,该派以坚持先知的“圣训”,反感个人意见和伊智提哈德闻名。其后,逊尼派和什叶派又继续分化,前者以四大法学派著名。而后者以十二伊马目派、宰德派、伊司马仪派闻

名。在现代,所有这些教派并无清楚的界限。

法学家和各教派分歧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对《古兰经》一些经文的解释上或者对一些“圣训”的理解、接受可否,或对一些立法的原则和根据的认识,或对一些实际问题的推理和判断存在分歧。下面的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

1. 关于一些经文解释的分歧

如《古兰经》说:“她们应享受合理的权利、也应尽合理的义务”。伊本·哈齐目(994~1064年)和一些表义学派的追随者据此认为,穷丈夫抚养富妻子是义务,但别的学派不接受此种解释,认为丈夫抚养妻子并非绝对的义务。再如关于给别人借债的好管闲事的人。马立克和罕百里(780~855年)二人依据“行善者,只受善报”的经文,给予债权人索回债务之权利。哈尼法、沙斐尔(767~820年)不赞同这种解释。他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好事者的所为被认为是捐献行为,由此,他无权要求债务人偿还”^[2]。

2. 对一些“圣训”接受可否的分歧

如法学家禁止为某个人利益而立遗产遗嘱。他们所据的“圣训”是:“不要让继承人持有遗嘱,除非核准遗产”。但什叶派不认可这一点,他们准许继承人持有遗嘱。

3. 对一些“圣训”的解释有分歧

如某人出售东西给别人,双方同意交易,那么当俩人尚未散开之时,其中一人可背约吗?关于此问题“圣训”说:“未散开时,两个生意人有选择的权利”。“圣训”强调交换公平、自愿,但法学家的认识不一致。沙斐尔、罕百里说:“此处的散开指永久的分开,应准许每个顾客同意乃至买卖讲价结束后仍可背约”。至于艾布·哈尼法、马立克,他俩解释此处散开的含义只是言语的。由此任何顾客当面同意约定后甚至双方仍在讲价时,禁止中止交易。由于对上述的“圣训”的解释有分歧,在这个问题上,立法裁决分歧就是必然的。

4. 对一些法律根据接受可否的分歧

分歧开始于公议和类比,因为一些学派积极接受或拒绝二者,而关于其他根据的分歧也扩大了,一些学派认可,而另一些否认。如马立克派认可公社事业和公共利益两个法理依据。哈乃斐派接受择善而从,同样,沙斐尔派的伊马目采用推理判断或随时酌情的立法依据。

如此以来,哈乃斐派的伊马目允许买卖满足人们的需要,禁止因滥用权利而造成过度损害。他们因有必要和麻烦而扩大了许多律例,那种分歧因类

比原则以及该派所持的从善原则而产生。

5. 同一学派的伊玛目对一些实际问题的法律裁决有分歧

如艾布·哈尼法不允许针对浪费者的禁忌,即浪费的和与其有联系的人。因为“禁忌是针对人性的行为,人性比金钱更重要伟大。”至于他的两个学生艾布·尤素夫和穆罕默德·本·哈桑,则根据众法学家的意见和许多法律证据认可禁忌。

总之,各学派的分歧不是对基本原则和教义的总的方面的分歧,而是对枝节的分歧,缘于解释或实践原则所循方法的不同。

伊斯兰法的弹性和模糊是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甚至有人说“民族的仁慈在于伊马目的分歧”,这在奥斯曼帝国得到了验证。在其司法实践中正式遵循哈乃斐派教法,同时也采纳其他学派的律例,尤其表现在家庭法方面。根据马立克派教法,当夫妻确实争吵时,允许两人分别诉讼。根据沙斐尔派教法,醉汉和可恶者的离婚是无效的,现在的埃及是照这样做的,因为埃及应用了其他伊斯兰法学派的许多律例,在关于新的公民条例方面,特别是在遗产、遗嘱和宗教基金问题上,遵循了其他学派的教法。

宗派众多造成了教义解释的盲目成见,并衍生出争吵、敌意和仇恨。于是每个学派的信徒都是与其传统和遗产相联系的,而不是与理智和思想相接近的。然后,党同伐异,严重偏爱本派伊马目的言论,歧视他派信徒,并进行恶意攻击和歪曲。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斗争就是如此。为此教派继续分化,造成了穆斯林的散漫。要实现穆斯林的团结,就要消除盲目的宗派成见、狭隘的派性,具体途径如下:

(1)以《古兰经》为首要立法原则。区分义务律例和自愿律例。区别天命律令和人为策略,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实施。

(2)许可“圣训”规定的宗教义务,要以各法学派都接受的可靠的、并不违背《古兰经》明文的“圣训”为条件。

(3)对伊马目有分歧的“圣训”,如果符合理智和法理学就应认可。

(4)只要符合现代社会需要、公共利益、公平正义原则,对其余法学家建立在伊智提哈德之上的律例,应该采纳^[1]。

这是实现伊斯兰法学宗派统一的现实路线,是穆斯林复兴的必要途径。倡导改革的先辈伊马目也主张统一,他们说“伊斯兰人民不能背负属于一个学派的传统包袱。不要使他们以难理解的某个学派

的典籍为准则安排其婚姻、家庭和生产。”法律统一的思想符合伊斯兰的精神。“伊斯兰是统一、团结、友爱、宽容,不承认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区别,不承认《古兰经》禁止的宗派成见。”《古兰经》说:“分离自己的宗教而各成宗派的人,你与他们毫无关系”。如果伊斯兰禁止人群盲信,命令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友爱宽容,那么,首先不允许穆斯林自己的宗派成见。的确,人有不同的思想感情并不可怕,倒是基于宗派成见的恶意、歧视才是危险的。恰如“阳光普照人间暖,人心无私天地宽”^[2]。

五、不明立法理由

伊斯兰的法学家,如阿布杜·萨拉姆、沙斐尔、罕百里、马立克等,认为教法、律例的创立是有其理由和目的的,“所有的理由和目的归于崇拜者的两世福利”。

依照“法治建立在存在的和起作用的理由之上”的根本原则,全部律例甚至律例所据的法律明文应当是随着法律实施条件的消失而不再实施。律例应当随着立法理由和目的的变化而变更,对此法学家所据的普遍原则为:不能否认律例随着时间、地点、条件变化而变异^[3]。

这方面的例子之一是传说中的哈里发欧麦尔废除了“心被团结者”受施舍的份额。他们曾是先知时代受财富救济的人,以便将其团结在伊斯兰一边,增强其信仰或抵制邪恶,其根据是经文“赈款只归于贫弱者、赤贫者、赈务管理者,心被团结者”哈里发欧麦尔依据明文所立的——伊斯兰初传需要援助——理由已消失,废除了这一点。因为欧麦尔时代伊斯兰力量加强后,这种理由消失了。

例二是传说艾布·尤素夫在做巴格达法官时,依照当时惯例,提出大麦和小麦交易凭称量进行。这就跟先知时代盛行的器量(如斗、升)交易的惯例不一致。在这个例子里,出售的律例因随着立法理由或惯例的变化而变更,许多有关交易的明文解释的变更也是如此。同样一些法学派依据社会需要和利益的变化,其创制立法也随之变更。

这就是伊斯兰法的灵魂,拒绝僵化、富有弹性。许多的哈里发、穆斯林法学家在讲述它、解释它、实践它。但是,当穆斯林忘了这项原则时,甚至惯例、需要变化了,时间、地点、条件变化了,民族、科学、技术、生活发展了,他们欲要法律稳定硬固,并认可那严格遵守没有变异和更改的法律。当大家都这样做了,其文明队列不可避免地行进迟缓了,其社会生活

落后了。应当理解法律的精神,当理由充足、条件许可时,就贯彻律例,当理由不足、条件不具备时,就重新解释和更正。伊本·赫尔蒙说得对:“世界各民族的状况、利益及其宗教不会持续为一种思潮和固定道路,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产生分歧,从一种状况转变为另一种状况……这是真主降给他的仆人的规律。”即承认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3]。

六、混淆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界限

伊斯兰法学家对宗教、法律和社会制度进行整体研究,因此,伊斯兰法包括了宗教信仰和社会交往的全部律例。由此,宗教和道德之间、宗教和法律之间相互影响。公道和行善就是如此,《古兰经》将二者并列在一段经文中:“真主的确命令公道和行善”,二者确实是一并执行的,甚至一个人不损害其兄弟已成为公道之一,忠诚、谏诤、宽容成为交往的义务。所有这些,毫无疑问成为使穆斯林受益的途径之一,使公正的人道的法律成为伊斯兰法的组成部分^[4]。

伊斯兰法学家以此为基础,在一些问题的法律裁决和宗教裁决之间存有分歧。这种分歧恰象当今学者关于文明死亡(安乐死)与自然死亡的分歧。例如他们认为,如果法律准许一个男人离婚——在宗教上是正确的,那么应当依据正当的理由。否则说明他对建立在情爱和仁慈之上的婚姻是糊涂的、忘恩负义的,不予离婚。但另一些法学家受蒙昧时代盛行惯例的影响,停留在残缺的地步上,他们并未用宗教命令的律例对这类事务进行裁决。假如他们那样做了,只可能是他们在审判中侧重于实践宗教和道德原则,那么这更接近于伊斯兰法律和教导精神。此后,特别是在模仿、衰落时代的法学家,尽管他们在司法裁决和宗教裁决之间划过一般界限。但在另外的场合里,他们也许忘记了划分,就把宗教与世俗混淆在一起,并在同一程度上研究了伊斯兰包含的宗教和世俗的一切。他们忘记了伊斯兰的根本是信仰及其教导,世俗及其事务是次要的。然后无节制地把所有这一切混淆起来,甚至把次要的世俗事务置于根本的义务的永恒的宗教法律的花园里。

由此导致了伊斯兰文化的僵化。一些穆斯林固执于微不足道的事务,甚至他们把先知时代或其时尚不认识的所有事物用被禁止的异端一词来称呼。如他们用教法意见禁止学外语、用汤匙吃喝、戴礼帽等此类次要的世俗事务。

如果回到伊斯兰法的本质,就会发现只有先知关于信仰和道德的教导以及有关论述才是穆斯林的义务,至于世俗生活的以及先知作为意见提出的“圣训”,则非穆斯林的义务。有一则“圣训”就是证据。据传说,先知路遇一伙正在给椰枣林授粉的人,他问:“这些人在干什么?”有人说:“他们在给椰枣林授粉。”于是他说:“假如他们不这样做,一定也行。”他们被告知了先知的意见,于是放弃了授粉之事,结果是果实没有成熟。当先知明白此事后说:“我只是传教,如果我命令的是宗教的事务,你们就采纳,如果表达的是对某事的意见,可以不接受,我只是传教者”,“你们更懂得世俗的事情”^[1]。

那么伊斯兰与世俗生活无关,除非是与伊斯兰教有关的部分,即宗教是信仰、独一、崇拜的律例、道德的律例和基本交往的律例。但除此之外,前述“圣训”已为穆斯林就世俗事务留下了自由,因为他们对此更有知识。也因为世俗事务是随着他们的利益及其需要变化而变化的,可灵活处置^[3]。

穆斯林应该理解这个法则,应当使教律脱离明显的一般的世俗事务,坚守信仰与道德法律,依照伊

斯兰精神、公共利益、科学与文明的需要指导与其生活有关的世俗事务,以此缩小差距,获得期望的幸福、成功与复兴。

综上所述,因形式主义、门户之见造成了法律不统一、思想僵化,导致了社会的落后。只有坚持立法基本原则,理解立法理由,适度分工,各负其责,求学上进,提高水平,才能适应时代,实现富强。即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的法律是实现穆斯林社会的复兴的必要途径。

参考文献:

- [1] [埃及] 艾布·萨利哈. 伊斯兰文化与当代社会生活(阿文版)[M]. 纽约—开罗: 富兰克林公司出版, 1962.
- [2] 古兰经[M]. 马坚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3] [巴基斯坦] 马茂德. 伊斯兰教简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4] 金宜久. 伊斯兰教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责任编辑: 杨彬智]